

文化周末

WEN HUA ZHOU MO



主持人:张思成

安康当代文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里,确实取得了过去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过的成就,出现了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兴旺景象。但是,如果横向地与周边地市同一阶段的成就相比,我们却应盲目乐观。

诗歌、散文虽然历来是安康文学的强项,新时期四十多年间出版的作品数量也最多,但大多停留在歌咏山水、抒发情怀的浅层审美境界,而且比较纤细清淡,既缺乏艾青、舒婷、贾平凹等超越传统载道意识,于质朴中寓寄深湛哲理的意境,又达不到北岛、余秋雨等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难成大气候。小说本来起步较晚,已发表、出版的作品主要缺憾一是没有很好地挖掘、利用本地题材优势,二是结构章法陈旧,笔致大多比较粗疏,三是缺乏独到、深刻的文化内涵,所以也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戏剧情况稍好,但由于经济投入不足,在制作、宣传上落于人后,也未能登上更高的台阶。安康文学创作思想艺术水平的局限,有着多方面复杂的原因。其一是人文地理传统的影响。安康独特的山水景观和多种文化形态互相交融形成的山地文化氛围在历史上曾陶冶出“三刘”和董诏、张补山等有影响的散文诗词名家,却鲜有境界高远、气魄雄浑的叙事大家。这种文化传统不能不对今天的作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但是,作家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地理人文条件只是因素之一,作家个人主观上的艺术追求也起着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就难以解释同样是出生于江南水乡的鲁迅、茅盾,何以写出了那么多深沉厚重之作的原因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安康作家似乎有些太拘泥于本地区传统文化格调的制约与影响,满足于用秀丽纤巧的彩笔写出一些描山绣水的诗歌散文。长此以往,形成一种艺术定势,就难以驾驭重大尖锐的题材。

其二是在认识生活、挖掘题材深层意义上缺乏独到的见解,在艺术表现上比较单调陈旧。从事文学创作,无疑需要基本的文学素养;要想写出千古流传的佳作,当然更需要具备出众的才华。但是,仅有这方面的条件,还不能成为大家。在中外文学史上,不少文学素养、才华相近的作家,创作成就却有很大差距,其原因就在于胆识,即艺术人格上的差异。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将这种胆识称为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

文学史上那些写出伟大作品,从众多作家中脱颖而出的人大都具有这种艺术人格。他们在对生活的认识上,能够发现一般人没有意识到的内容,并有胆量不迎合时尚地将其表现出来。我省作家陈忠实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成名作《信任》,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并使他登上当代文学巅峰的《白鹿原》,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切入的角度等方面都显示了超越既定政治概念的过人胆识与勇气。在这方面,安康作家的不足也是很明显的。无论是写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在对生活与人物的认识与把握上,都局限于已有的定论,不能像陈忠实那样从人性和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加以挖掘和表现。切入点上比较单一呆板;艺术处理上写一般性的过程多,精心建构重大事件和细腻描写生活细节不够;人物刻画上远用传统的白描手法多,而揭示人物复杂心理少。这样,从总体上就显得境界不够宏大,艺术格调粗疏简淡有余而细致浑厚不足,难以达到精品的档次。

影响安康文学出精品,登上更高台阶的另

走出冲刺文学舒适区 进入创作舒适新境界

□ 姚维荣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镜子。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本期刊发我市评论家姚维荣同志的评论文章,总结了安康文学创作的经验,指出了短板和不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确为一家之言,其中不乏尖锐之词,但其拳拳之心可见。希望以此引发广泛思考和讨论,进一步解决有高原缺高峰等难题,推动安康文学迈向更高的境界。

——编者

“来鹿堂”是清代安康最早出现的印刷书局,悬匾时间为“道光壬辰夏四月”,即道光十二年(1832)。“来鹿堂”取名盖因堂主张鹏飞之远祖禄公兄弟六人在安康牛山大岭居住时,有鹿入其堂,驱之不去,取其吉祥之意,作为堂号。后来便以“来鹿堂”之名,从事雕刻印刷,堂号亦为书局字号。

堂主张鹏飞对其堂号亲自书写牌匾,并在牌匾右方刻有一段耐人寻味的释文:“先高祖之祖昆季六人,友爱极笃,和蔼之气萃于一堂。盛德感孚,有麋鹿二十四蹄来憩于牛山麓别墅,饮食驯扰经旬,驱之不去。至今父老递相传述,竟成吾门佳话。谨拈此以名堂俾我后人,顾名思义,同敦友爱,以继先德是则,鹏翂有厚望焉。道光壬辰夏四月上浣 云吉鹏翂敬跋并书。”

从现今图书馆检索系统可知,早在道光七至十一年(1827—1831),来鹿堂就刻印发行《康济录》《远西奇器图说》《四音释义》等经、史、子、集多部,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来鹿堂堂主名张鹏飞,字扶九,号补山,又名鹏翼、鹏翂。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少时家贫,食菜根以度日,编蒲叶以抄书,嗜读为乐。7岁时由安康牛山

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缺乏对事业执著的热爱,韧性的拼搏,宗教徒般的献身精神,不断超越已有成功,向更高文学目标攀登的抱负与雄心壮志。在这方面,陕西前辈作家柳青与同代人路遥是两面最好的镜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柳青相继出版了《种谷记》《铜墙铁壁》两部长篇,在文坛声誉鹊起。他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报》,担任编委、副刊主编。但是,为了向新的、更高的文学目标攀登,他毅然放弃在北京的工作,离开物质文化条件优越的首都,自愿回到陕西,在长阳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以与农民共事的方式,深入感受体验新的时代变革在农村生活与农民精神上产生的巨大变化。经过六年认真准备和辛勤耕耘,写出了轰动当时文坛的《创业史》。柳青生前有一句名言:“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意思就是说,贪图舒适安逸生活的人是不适应从事文学这种需要忍受孤独、寂寞和沉重精神负担的事业的。起码,没有吃苦献身精神是不可能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

柳青的文学观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后辈乡党路遥。当他的《人生》获得巨大成功,誉满文坛时,他没有沉溺于鲜花掌声之中,而是深刻地认识到:“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命感,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暖的港湾;应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作家的劳动决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正是这些从人生大境界出发对创作的真知灼见,使他没有被《人生》的成功冲昏头脑,又确立了向《平凡的世界》冲刺的更高文学目标、人生目标。为此,他付出了六年艰辛劳动,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小说发表、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荣获第三屆“茅盾文学奖”,进入“百年百部文学精品”之列。他虽然因此43岁便英年早逝,但他的作品至今还在读者中广为传颂,他启迪、感召后人的强大人格力量,使他的生命获得了永久的升华。

和柳青、路遥这种视创作为生命存在的根本意义的态度相比,安康作家在这方面的差距很明显。我市起步较早,已有了几十年创作历程的一批作家之所以长期在一个平线上徘徊,不能登上新台阶,除了前面谈到的几方面因素外,缺乏柳青、路遥这种为文学吃苦献身的精神境界,无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有的小有成功便得意忘满,缺乏更远大的抱负;有的则不断变换创作门类,虽然涉猎甚广,著述颇丰,但都没有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安康文学新时期以来的总体格局便显得量多而质平。这样,自然难以在更大的范围里产生影响。

最后,外部条件的欠缺与某些不良因素的负面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安康文学的更大发展。新时期四十多年来,安康各级党政领导对文学的关心、扶持的确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但和省内其它地市比起来,还显得力度不足。比如在文艺团体的编制、办公条件、经费划拨及对创作出版的扶持等方面,都与别的地市有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文艺界自身群体意识较差,缺乏和衷共济、齐心协力繁荣文学事业的宽广胸怀,时有内耗发生。这就难以保持平静、良好的创作心态,难以集中精力进行苦心孤诣的艺术磨砺,以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

所以在未来的时间里,安康文学要有大的突破,首先就是作家和文化官员的思想认识水平要有大的突破,从而进一步开阔艺术视野,开拓、深化题材领域,不断丰富与提高艺术变现技巧。

从中外几千年的文学史看,那些传世的、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作品,绝大多数总是以真实

反映现实、反思历史的得失为主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学作品等同于一般宣传品,因为后者是以浅近的现实功利因素为主要标准的,这方面我们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教训不少。作家有幸欣逢目前这个比较好的文化环境,就应该好好珍惜和利用,既要满腔热情地讴歌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在革命斗争年月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中创造的丰功伟绩,也要敢于直面历史,对文革大破坏、1983年大洪灾等进行客观、深入的描写,以总结教训,启迪后人。

一个真正的作家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社会态度,就是通过写作,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社会的正义与道义,以人文价值理想表达对社会问题的理性批评和反省。

安康新时期几十年的文学创作,尽管成绩突出,但与波澜壮阔、纷纭复杂的社会进程相比,还是相对滞后,深刻描写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展现当代人精神风貌而又具有长远艺术魅力的作品还不多,这是应该克服的不足,应该努力的方向。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建设和谐社会,从封闭保守的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化,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过程,需要文学的积极配合与深层推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人民和时代呼唤对当代题材创作的重视,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需要作家尽快地完成转变的自觉,在创作实践上获得深刻而生动的反映当代生活的能力。

其次,关于历史题材和民间生活素材的吸取、民间风俗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安康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文学素材,有待作家去挖掘利用!遗憾的是迄今我们还没有出现凌力、霍达、二月河、唐浩明、熊召政等善写历史题材的大家。所以,这个领域还有待安康作家下大功夫,花大气力去开掘、利用,写出与我们丰富、深厚的历史相称的历史题材佳作。另一方面,我们从历史到现实的民间生活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创作营养,加强对民间精神、民间智慧、民间诗情的体认、消纳和再造,既可深化对人性、民情的理解,又能弘扬地域文化的特色,对文学创新和文学流派的形成,都会有相当大的助益。

最后,要广泛读书、更新知识结构,使自己的生活思想和艺术思维永远保持最新最活跃的状态,才会对发展着的生活和生活中出现的某些复杂现象保持最冷静最灵敏的感受。作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读书和艺术创造的同时注意自身修养,不断强化自己的人格力量。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作家的人生观、人格修养、精神境界,必然渗透到自己的作品中,而且必然要影响自己作品的品位和精神力度。在商品大潮冲击的今天,在某些陈腐的市侩哲学享乐观念浮泛的情况下,作家要保持自己的心灵的洁净,要保持自己的精神纯洁度,保持自己内心的良知和正义感,铸造自己强大的人格力量,这样才能保持对中华民族的深沉不渝的责任心,才能深层地激发创作上的困惑和痛苦,保持对文学的神圣理想,这也是塑造安康作家的整体形象中对每一位志同道合者提出的勉励和要求。

忆往昔风光无限,望未来任重道远。重大的社会历史转型期和物质生活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往往也是文化复兴、文艺繁荣、造就大作家、大作品的历史契机,时代呼唤着大作家、大作品的出现。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大好环境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事业一系列论述的指导下,我们安康作家要有大气魄,大雄心,创造更好的文学精品,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的精神食粮,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思成 摄

本报讯(记者 梁真鹏 通讯员 邬一凡)11月3日下午,应长银银行汉滨支行的邀请,市诗词学会一行30人,深入该行开展采风活动,加深诗词作者对金融行业的了解,增进双方的交流和友情,用诗词曲赋形式,宣传长银银行对汉滨区地方经济和民生发展所做的业绩,受到该行的热诚欢迎。

该行于2013年4月开业,是一支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队伍。采风团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该行营业大厅,听取了讲解员对该行基本情况,以及主要金融产品、现代科技支撑的各类服务设备的介绍,并与该行员工们进行了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副校长李波向该行赠送了学会主编的《秦巴明珠风景——安康旅游诗韵》和《牛山诗文选》等书籍。长银银行客户经理向大家介绍了反假币工作和长银银行信用卡、电子银行、主要理财产品等金融知识,开阔了诗人们的眼界。

通过参观和座谈,为诗人们提供了第一手的创作素材,激发了采风团各位老师们的涌动的诗情与灵感,纷纷现场作诗,赞美长银银行。李波一马当先,即席赋诗一首,长银银行采风口占:“卓越数长安,誉满金州众口传。笔著华章皆妙手,女神撑起半边天。”

李波此头一开,采风团成员们争先恐后地展示了各自的作品,有律诗绝句,有词作与散曲,形式多样。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刘绍波词曰《沁园春·长银银行》:“绿色金州,山水多娇,物阜民丰。有瀛湖叠翠,鱼虾肥美,香溪绿道,暮鼓晨钟。富庶之乡,秦巴胜境,生态明珠别样红。城乡美,创新发展,逐梦腾龙。紧跟时代争雄,富路广、为宏业建功。喜心牵百姓,资源万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服务城乡,以人为本,鼎盛长安信誉崇。财源广,向黎元注爱,国祚昌隆。”

据不完全统计,当场展示的诗词曲作品计有35首之多。采风团最长者,2017年央视“诗词大会”百人团”成员鲍善懋先生展示作品《定风波·初访长银银行》;“十年硕果繁,搏击市场战急湍。服务城乡中小企,崛起,三秦父老尽开颜。产品丰富助财运,诚信,赶超超越更争先。发展创新花似锦,精品,金融翘楚望长安。”

来鹿堂与关中书院

牛谦才

脚下随父迁居兴安府新兴里三甲,今新城南正街。嘉庆十八年(1813)拔贡,道光元年(1821)中举,准荷为孝廉方正。

道光十七年(1837)二月,张鹏飞进京考贡生。开考前几天,他冒天下大不韪,竟封章上奏“治平二十四策”,被群臣以“越职言事罪”而劾,受罚27天,幸得道光皇帝开恩,未革举人,放归故里,令其不得越方圆百里。安康地方人才称其为“卧地牛”。

回到故里后,张鹏飞并没有因政治上的失利而消沉。相反更多地投身到家乡的各项公益事业中,先后修关南书院、考院、建乡学、修文庙等。尤为扩大来鹿堂印务,增加图书发行,向地方书院捐赠书籍,就是张公最值得被书写的歷史事迹之一。从道光十七年(1837)回归故里至咸丰七年(1857)逝世的20年间,他从四川招募数十名书画和雕刻能手,刻书达240多种,刻印的图书在汉水流域广为扩散,除了行銷关中、陕南、四川和湖北等地外,至今在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图书馆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均有来鹿堂雕版藏书珍品。

来鹿堂所刻书籍虽然多达240多种,但因时代久远,加之解放后各种运动多,大多散失。在现今图书馆检索系统仅

检索到(包括不全卷)36种。笔者收藏有关“道光庚戌来鹿堂印版”《关中书院课士赋》四卷、“咸丰辛亥来鹿堂印版”《关中书院课士诗》四卷,赋与诗共八卷同装蓝皮书盒。此八卷均不在检索目录之内。道光庚戌,即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辛亥,即咸丰元年(1851)。“印”即雕刻。笔者有必要提及的是:张鹏飞的活动范围虽然受到朝廷的严格限制,但人格力量和文化传播的影响却无法阻隔。由他纂编、撰写释、解、评、及最终完成的雕刻版本成为关中书院课士范本,在安康境内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关中书院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十月,由时任陕西省布政使汪可爱、按察使李天麟等官员发起创建。雍正十一年(1733),清政府拨银一千两,作为书院经费补贴。乾隆二十一年(1756),高宗皇帝御赐“秦川浴德”匾额。考课有诗、古文、词、试帖、策论、杂著等。每月一官考、课堂测验2至3次,甚至有巡抚、学政也前来听课。关中乡会试中膺馆选者多为书院之士。作为明清两代陕西的最高学府和全国四大著名书院之一,张鹏飞雕刻的《关中书院课士赋》和《关中书院课士诗》,昭示着安康这块土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位笃实的教育家和出版家。



市诗词学会走进长安银行采风